

期颐述怀

杨敬年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期颐述怀

杨敬年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期颐述怀/杨敬年著.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7.5

ISBN 978-7-310-02698-2

I. 期... II. 杨... III. 杨敬年—自传 IV. K82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2075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肖占鹏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20.875 印张 6 插页 276 千字

定价:50.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躬耕经论教泽广布爱国育才
畅抒报国志
攀峰不辍期颐著述一代宗师
南开精神魂

薛进文

二零零七年三月

德高慕仰 智圓行方 談人性
學貫中西 經世濟民 論富國

饒子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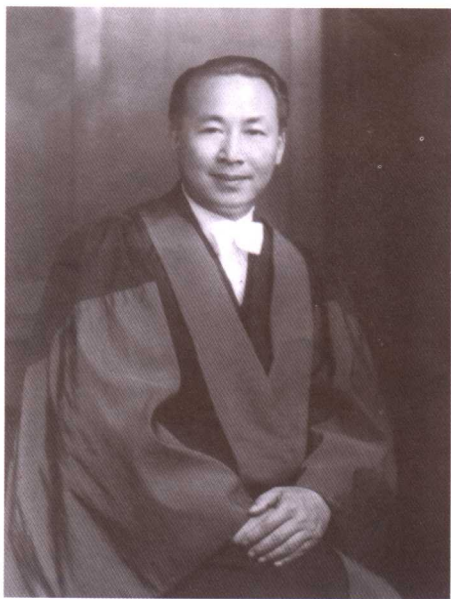
丁亥於南开



杨敬年和妻(李韵兰)、子(杨修慧)在贵阳婚后第一张照片



杨敬年在兰州告别妻(李韵兰)、女(杨明漪)出国
1945年



杨敬年被授予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后留影
1948年6月



反右前杨敬年一家 1957年
左起妻李韵兰、子杨修慧、女杨明漪、内侄女朱倩兮
(自幼由姑祖母扶养,改姓朱)、杨敬年



杨敬年和妻(李韵兰) 1980年



南开经济研究所老校友重逢(天津解放初期)
左起:前排谷源田、杨叔进、陶继侃。后排刘
君煌、杨敬年、鲍觉民、鲍太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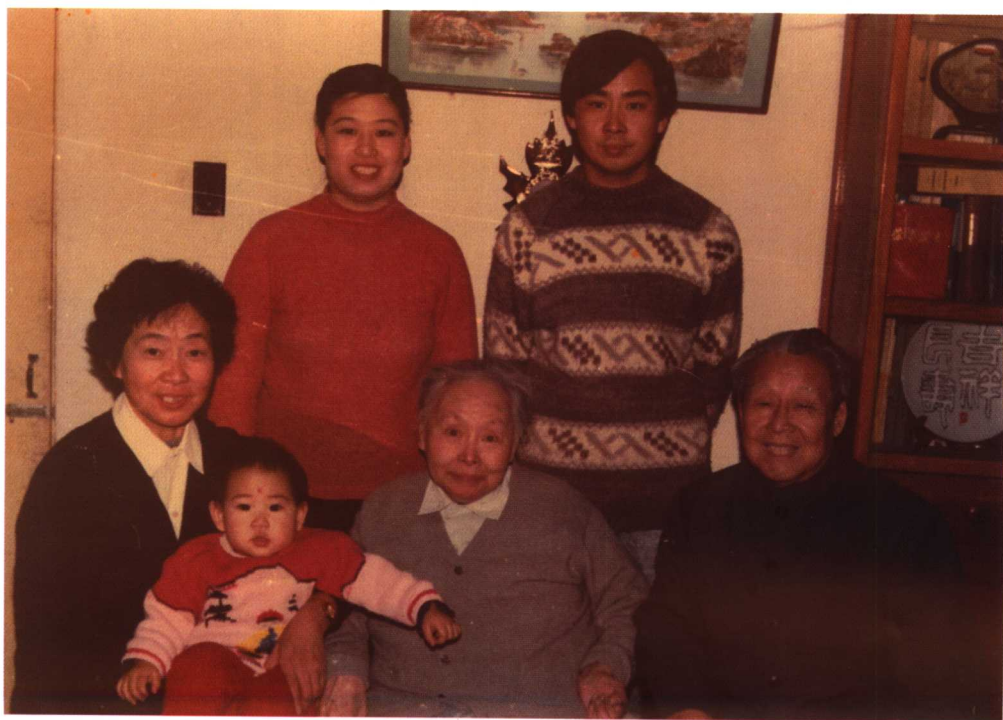
杨敬年在经济系资料室 1960年



财政系1952年毕业同学合影



杨敬年近影 2006年



杨敬年的一家。左起前排儿媳黄桂琴、曾孙女杨素雅、妻李韵兰，后排孙媳胡洁瑛、孙杨华 1989年

谨以此书纪念

我的外祖父黎葆初

我的叔祖父杨志高

序 一

谷书堂

杨敬年教授是我的老师，他在天津解放前夕回到南开。1949年我选修了他开设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课程，这门课使我第一次知道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许多思想家，例如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等人的先进思想和行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0年我毕业后在市里工作过很短一段时间又调回学校，这样我和杨先生接触的机会就多了。我记得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经常到杨先生家中向他请教一些学习和研究方面的问题，每次他和他的夫人都很热情地接待我，杨先生还很耐心地向我介绍包括论文、查文献等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杨敬年和谷书堂

1956年以后，由于社会政治气候变化和“左”的思想干扰，我们之间的正常联系被中断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虽然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隔绝,但是杨先生留在我脑海中的印象却是深刻的、清晰的。总之,他在课堂内外对我的教诲是令我难以忘怀的。

首先一个印象是杨先生的勤奋好学,并且他是持之以恒的。我知道他青少年时期家境贫寒,是在亲戚的帮助下获得读书的机会,所以他上学很晚,他来南开经济研究所读研究生时已经三十多岁了。后来他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又考取了公费留学到英国牛津深造。学成回国后,他一方面教书,一方面还补学俄语。我记得1952年暑假期间,在周总理倡导下,全校教师都集中时间突击攻读俄语,杨先生也参加了。秋季开学后,大家都忙于上课,突击时获得的那点俄语收获就顾不上继续巩固和进一步学习了,只有杨先生始终不渝地坚持下来。当我们学的那点俄语都忘得差不多了的时候,他却一本又一本译出了俄语经济理论著作。

如果从一个较长时段对杨先生的经历和表现加以观察,将不难发觉到他身上蕴涵着一种惊人的毅力。在他一生坎坷曲折的经历中,每当身处逆境,他都能荣辱不惊地以平和心态去面对,他没有消极,更没有悲观,因为在他的内心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支撑着他。他热爱生活,他坚持自己的良知,他对自己的历史有一个清晰的判断。在是非曲直一时难以澄清的条件下,他能耐心等待,因为他坚定地相信事情的真相必有一天会水落石出,恢复本来的面目,因而他就能够以平常的心态面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挫折和打击。这一点不仅使杨先生能够坚持正常的生活和工作,而且这种心态很可能也是他能够健康长寿的重要因素。

说到健康长寿,恐怕不少人都会对杨先生的长寿和健康感到是一个奥秘。因为百岁老人本属少见,长寿而且又很健康就更加难能可贵。即将欢度百年华诞的杨先生不仅具有健康的体魄,而且耳聪目明、思维清晰,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我认为他之所以能保持这样一种身体上的良好状态,除了他的正常心态之外,他还具有一整套科学的生活习惯和合理的时间安排,他坚持早睡早起,数十年如一日。他每日凌

晨三四点钟起床后就利用夜深人静、头脑清楚的有利时刻进行工作和学习，然后就是晨练。多年来他已积累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保健操，不分寒暑，坚持不懈。如果遇到坏天气，他就在室内活动。他合理地分配时间，很少参加没有实质内容的应酬活动。他到了高龄时，还通过学习一门新的外语和敲打电脑来保持头脑的灵敏反应。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在 99 岁高龄时还能写成这本《期颐述怀》。

我对杨先生的接触和了解是有限的，我所能提到的点滴远远不能概括他丰富而精彩的人生。为了更好地从杨先生的一生经历和表现中吸取丰富的营养，我认为莫过于去认真读一下他亲身的总结 and 介绍——《期颐述怀》，我相信凡是读过这本书的朋友和青年同学肯定都会获得多方面的启迪。最后，我也衷心期望在杨先生的百年华诞之后，还会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使我们可以继续从他那里获得教益。

2006 年 11 月 28 日

序 二

熊性美

一个学者奋力前行日臻完善的人生写照

—

我和杨敬年教授在南开园已经相处逾半个世纪。1950年我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做研究生，杨先生是财政学系的教授、系主任。1952年我毕业后留金融系任教，那一时期南开财经各系经过“院系调整”，已经动荡不定，我和杨先生是点头之交，只听说这位资深教授是牛津大学博士，英语俄文都特别好，给我的印象是彬彬有礼而话语不多，有点矜持的绅士风度，实际上彼此没有什么业务往来。1957年以后政治风云变幻，南开大学是知识分子首遭冲击之处，许多饱学之士包括杨敬年先生纷纷落马，从此以后，我们之间更没有什么接触了。

其间有一件事，杨先生可能已忘记，我却至今印象深刻。1962—1963年期间，我和孙兆禄已调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短时间从事美国和西欧国家的农业生产及农产品贸易的调查研究。在当时看来，这是一个偏题，搜集资料相当困难，到北京也不顺利，闲谈间有人建议我们到本校经济系资料室查一下，我心存疑虑，最后还是去了。这次去，具体资料搜集了多少是次要的，主要是大开眼界，陈国庆、杨敬年两位先生对我详细介绍了经济系西文书刊的情况，陈先生主要是阐述如何编制一套对外征订的世界商情资料卡片，杨先生则主要介绍许多英、俄文期刊资料的背景和具体内容，对我提出的专门问题，也给

予了中肯的回答。坦率说，我原来有一种潜在的自傲：别看我政治上不行，业务上，特别是毛主席批示加强研究的西方世界经济，到北京也敢比画比画。想不到就在校本系的资料室，牛津的博士加上燕京的高材生，刹住了我的傲气，给我上了切实一课。

我回去对孙兆禄如实描绘，认为南开经济系资料室和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我们当时在那里进修）的图书资料室相比，特别是在管理服务方面毫不逊色，孙兆禄听了后反应说，（南开资料室）那里本来就是藏龙卧虎的地方！没想到，这么一句漫不经心的话，“文革”期间也成了反党罪状。

1979年我获悉杨敬年教授得到平反恢复名誉时，对于听到的有关情节多少感到意外，在历史事实与罗织罪名之间，过去的认定怎么会如此离谱？但回顾全国发生了多少冤假错案，心想老先生在南开大学总算摆脱了强加多年的政治污垢还以清白之身，值得庆幸。那时我知道杨师母卧病在床，杨先生悉心照料，但愿老两口能迎来一个颐养天年的平静生活吧！

1980年以后，经济系和经济研究所的接触日多，不断听到看到杨先生在科学研究和教学等工作岗位上做出了日益众多的贡献，又常常感到诧异：老先生还在干，并且如此出色。对他的尊敬自然愈益增长。基于我的传统认识，学者视业务工作为生命第一需要，可以理解，难能可贵。后来听到杨师母逝去，幸而女儿杨明漪调回天津，亲人拥簇，愿杨先生能继续发光发热，保持精神爽朗，体魄健康。

上世纪末，我获赠一本《人性谈》。本世纪以来，先读了杨先生的自述《学术生涯五十年》，近日又捧读《期颐述怀》文稿，杨敬年教授的身影神韵日益清晰高大起来。这才知道，杨先生不仅是一位历经人生坎坷始终秉持报国理想的爱国者，不仅是治学严谨、坚持攀登学术高峰且诲人不倦的南开学者，更是一位怀着人生理想、探索人生哲理的智者。

杨敬年教授通过《期颐述怀》告诉我们，他如何在漫长一生中的

各个转折关口，对准人生目标或不断测度调整，一经决断就毅然向前。我在这本自述文本中屡屡读到充满睿智的哲理，却很少听到忧郁、犹豫的话语。展现在作者人生旅途的是一条阳关大道吗？显然不是，他不怨时运不济，而是在百年时距中不屈不挠，奋力前行，在一个个政治风暴冲击下不气馁，在一个个学术成就前不停顿，并总结人生经验说，“自己是比较幸运的”。《述怀》居高望远，谦虚朴实的自我评价，弥足珍贵。



杨敬年和熊性美

二

我以为，杨敬年教授的百年人生轨迹，有许多难能可贵之处。

第一，从1957—1978年的政治磨难中挺过来。在《述怀》中编的有关回忆，主要是叙述作者在两次政治运动中的经历史实，却找不到表达怨恨愤懑的片言只字。是作者忘记了过去么？不像，因为记载的事实情节相当详尽；是作者对抒发个人感情有所顾虑么？我认为也不是，因为叙述的语气平缓自然，在更深的层次上表达了个人的感受和对政治运动的理性分析。请看作者的如下感受：“对我的右派问题之所以作出错划错判，其症结就在于不给被告以为自己辩护的机会。盗用党的崇高威信和政府机器的强大压力，去对付一个渺小的个人，当之者没有不粉身碎骨的。”关于遭受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的冲

击。作者认为，一方面，“我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精神上、身体上经历的种种辛酸，已经作为历史事实，长留于天地之间，岂是一纸平反文书所能消灭的”；另一方面，“文革对我有极大的影响，它为我提供了长达六年的从事劳动和接近劳动人民的机会，我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使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根本的变化，立场和世界观有了彻底的转变，为十五年后参加中国共产党铺平了道路”。最后作者总结说：“我总觉得，政治运动是不能持久的。运动可以作为革命的手段，但不能以之作为治国的方略，欲图国家之长治久安，必须实行法治，而辅之以德政。”

作者的这几段个人感受，并非激扬文字，读起来清净朴实，漫溢真情。“文革”时期我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重点审查对象或曰牛鬼蛇神，1966年初夏到1969年暮春这一阶段，我和杨敬年（都是彼此直呼其名）时不时被划分在一起，或要求揭发，或强制劳动，或接受批斗，或交代问题。我的印象中杨敬年劳动时，认真去干，休息时始终神情肃穆、沉默无语。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一个力求维护人格底线的知识分子还能做什么呢？

第二，杨敬年教授挺过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政治风暴的冲击，不顾年事已高，壮心不已，立即从事发展经济学的教材建设、研究生培养以及有关课题的科学研究，还翻译出版了几百万字的专门著作，学术贡献有目共睹。应该说，南开学人这种人生奋斗中不埋怨、不停顿，抓住机会积极从事专业学术工作的精神，是最最难得的。

我愿提供一些历史背景材料：

杨先生回忆说，1982年在全国高校率先给研究生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实际上，在上个世纪整个80年代，南开大学已形成了一整套为建立发展经济学的具体安排，先是开课，再是提供教学用书，不仅自己编写课程教材，还有供进修者研读的参考资料（即后来正式出版的《文献选读》）；与此同时，不断遴选专门课题进行有关科学研究，如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中的若干重要关系问题。此外，还立足于发